

魯迅：  
人生當如大象



我與魯迅是同鄉，還曾經與魯迅是鄰居——他住大陸新村九號，我在大陸新村三號出生、長大——雖然不是同一個時代。少年時期，讀著魯迅的書成為文青，模仿他的文筆，以至於八十年代發表知識分子文章時，很多讀者以為我是一個飽經風霜的老人。

我從來沒有寫過魯迅。寫魯迅的人太多，幾次想動筆，都放下了。特別是喜歡胡適以後，似乎與魯迅更遠了。不過，魯迅依然揮之不去，雖然思想有距離，但心似乎是相通的。然而，最近我重新讀了魯迅，以及王曉明、錢理群兩位對魯迅的研究，讓我忍不住想說說魯迅，特別是他的虛無主義。

是的，魯迅骨子就是一個虛無主義者。這是五四時代普遍的精神症候。晚清思想界的旋律是高昂的，不僅儒家的價值體系依然存在，而且新的進化論思潮也讓人充滿了對未來的憧憬。然而，到了五四時代，王權崩解了，儒家的信仰也隨之沉沒，舊的已經逝去，新的尚未立足，於是，五四便成為了一個虛無主義的時代。政治秩序陷入混亂，心靈秩序也破碎了。

錢永祥先生提出過，在一個祛魅的世俗化時代，當傳統的絕對價值衰落之後，人們有兩種不同的應對態度：「縱慾」與「虛無」。所謂「縱慾」，乃是對於意義的存在有太多的幻覺，對於人類創造意義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。而所謂「虛無」，乃是當縱慾的亢奮過後虛脫挫敗，幻覺與信心瞬間崩解，淪為對一切價值的麻木形態。縱慾者靠奢侈的希望而

生，不敢正視希望破滅的事實，虛無者則放棄一切希望，不敢在廢墟中有所堅持。〔二〕  
細細觀察一下五四時代，何嘗不是有這兩種態度？周作人有一段話：

在悲哀中掙扎著正是自然之路。這是與一切生物共同的路，不過我們意識著罷了。路的終點是死，我們便掙扎著往那裏去……我們誰不坐在敞車上走著呢？有的以為是往天國去，正在歌哭；有的以為是下地獄去，正在悲哭；有的醉了，睡了。我們——只想緩緩的走著，看沿途景色，聽人家談論，儘量的享受這些應得的苦和樂。〔三〕

知堂老人，在這裏描述的，是面對舊價值的崩解，無路可走時，四種不同的「縱慾」與「虛無」。第一種「縱慾」是精神性的，找到了新的皈依與信仰，「以為是往天國去」，這是五四後期出現的各種主義以及為主義獻身的狂熱。第二種「縱慾」是物慾性的，「醉了」、「睡

【一】錢永祥：《縱慾與虛無之上：現代情境裏的政治倫理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二〇〇二年），頁九四—九五。

【二】周作人：〈尋路的人〉，載鍾叔河選編：《周作人文選》（廣州：廣州出版社，一九九五年），頁二四八。

了」，精神的信仰既然隕落，那麼就沉湎於身體的慾望之中，成為一個永遠叫不醒的裝睡之人，這是杜亞泉犀利批評過的民初功利主義狂潮。第三種是逃遁的「虛無」，李叔同出家、朱謙之試圖自殺，周作人以平和的心情，苦中作樂，成為在世的隱士。而第四種呢，則是另類的「虛無」，「以為是下地獄去」，以戰士的姿態「悲哭」。這，在我看來，就是魯迅先生。

魯迅的虛無，似乎與生俱來。少年時代家道中落，祖父下了大獄，作為長房長孫的魯迅，從人人奉承的少爺跌入到處處遭受親戚街坊的白眼的境地，讓他的心靈遭受了創傷，一生從未痊癒。在肅殺的世態炎涼之中，他更多感受到的，是人心中的冷酷，「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墮入困頓的麼，我以為在這歧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」。<sup>[1]</sup>

在日本留學期間，恐怕是他最為意氣風發的時候。他自比尼采式的「魔羅戰士」，相信文學的力量可以拯救眾生墮落的靈魂，而自己，正是啟蒙群氓的精神救世主。然而，他以滿腔心血編的《新生》雜誌，卻受到了冷遇，印了一千五百本，只賣出去一百本，玫瑰色的啟蒙之夢破滅了。他發現自己在茫茫人海之中，只是「一小撮」：「凡有一人的主張，得了贊和，是促其前進的，得了反對，是促其奮鬥的。獨有叫喊於生人中，而生人並無反應，既非贊同，也無反對，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，無可措手的了。這是怎樣的悲哀啊，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。」<sup>[2]</sup>

這就是為什麼當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，魯迅反而意興闌珊。他似乎悟透了一切，像他翻譯的俄國小說《工人綏惠略夫》中的主人公那樣，「要救群眾，而反被群眾所迫害，終至成了單人，忿激之餘，一轉而仇視一切，無論對誰都開槍，自己也歸於毀滅」。<sup>〔三〕</sup>以他懷疑的性格，認定民眾多半要迫害啟蒙者，從蘇格拉底、耶穌，到雪萊、拜倫，不是死於民眾的圍觀，就是被庸眾視為異端。革命者就義，看客吃冷血饅頭，是多麼令人心寒的景象！即使後來魯迅被錢玄同說服，重新拿起了筆，內心未必有多少暖色，眼前晃動的，都是小說《藥》中那些華老栓式的愚眾身影。

魯迅對鐵屋子的頑固是深有感受的，他說：「試將記五代、南宋、明末的事情的，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，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，彷彿時間的流逝，獨與我們中國無關。」<sup>〔四〕</sup>與緩慢的文明進步相比，人的生命實在太短暫了，十年、二十年對於人類歷史，只是一瞬而已，但對於個人來說，卻是漫無盡頭的煎熬，如同行走在長長的隧道之中，看

【一】魯迅：〈吶喊·自序〉，載《吶喊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一九七三年），頁一。

【二】同上，頁四。

【三】魯迅：《兩地書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一九七三年），頁十六。

【四】魯迅：〈突然想到·四〉，載《華蓋集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一九七三年），頁十二。

不到依稀的光亮。

那麼，啟蒙的意義究竟在哪裏？喚醒了沉睡者，究竟是善，還是另一種惡？魯迅猶豫地承認：「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。做夢的人是幸福的；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，最要緊的是不要去警醒他。」〔一〕甚至，他有點懷疑，自己在無意中就是一個幫兇，「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『醉蝦』，蝦越鮮活，吃的人便越高興，越暢快。我就是這醉蝦的幫手。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，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嗜加倍的苦痛，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，得到格外的享樂」〔二〕。

魯迅的悲觀背後，是對他曾經相信過的歷史進化論的失望。在出山之作《狂人日記》之中，他悲哀地發現，國人一方面在被吃，另一方面也在吃別人。但此時的他，依然將希望寄託於還不曾吃過人的孩子，「救救孩子」的聲音雖然微弱，畢竟還是有盼頭的。然而，一九二七年國民黨發動的清黨運動，讓魯迅感到透心涼，不惟被殺的是青年人，殺人的同樣也是青年人，其中有穿著軍裝的趙武夫，也有帶著金絲邊眼鏡的書生，投書告密、助官捕人，以各種方式加入屠夫陣營。他沉痛地說：「我至今為止，時時有一種樂觀，以為壓迫、殺戮青年的，大概是老人。……現在我知道不然了，殺戮青年的，似乎倒大概是青年，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，更無顧惜。」〔三〕

他一定想起了他的老師章太炎獨特的「俱分進化論」，歷史的進化總是善惡並進，善在進化，惡也在進化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每一寸進步所要付出的代價，有時候就是不可承受之重。最大的惡，不是以惡行惡，而是以善的名義所行之惡。惡本身是有限度的，因為行惡者自覺理虧，尚有所畏懼，但一旦罩上了某種善的神聖光環，行惡者就理直氣壯，無所顧忌。

魯迅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清黨運動中所目睹的，就是這種以善之名的殘暴。他對日本記者說：「中國革命的歷史，自古以來，只不過是向外族學習他們的殘酷性。這次的革命運動，也只是在三民主義——國民革命等言辭的掩護下，肆無忌憚地實行超過軍閥的殘酷行為而告終。」<sup>【四】</sup>他發現：「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。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。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，或當作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，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

【一】魯迅：〈娜拉走後怎樣〉，載《墳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一九七三年），頁一二九。

【二】魯迅：〈答有恆先生〉，載《而已集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一九七三年），頁四三—四四。

【三】魯迅：〈答有恆先生〉，載《而已集》，頁四二—四三。

【四】山上正義：〈談魯迅〉，載《魯迅生平史料彙編》第四輯（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三年），頁二九六。

命的或反革命的。革命、革革命、革革命，革革……」<sup>〔二〕</sup>魯迅具有一副常人沒有的犀利目光，他穿透歷史表層的各种霧障，看出了血腥廝殺的對立雙方，其實共享同一個邏輯：少年屠龍，自身亦成為新的惡龍。如此循環不已，在暴力與血污之中，得勝者往往更為不堪。

正是有這樣的警惕，他對各種組織性的暴力一直持有保留態度。在日本留學期間，他加入過光復會，有一次組織委派他回國去刺殺清廷的大臣。魯迅猶豫地問：「如果我被抓住，被砍頭，剩下我的母親，誰負責贍養她呢？」光復會大為失望，收回成命，認為他不配革命。而魯迅，則對各種強迫別人的犧牲，是頗為不屑的。他對許廣平說：「革命者叫你去，你只得遵命，不許問的，我卻要問，要估量這事的價值，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。」<sup>〔三〕</sup>許廣平問他，是否要去參加國民黨，魯迅回答說：「如要思想自由，特立獨行，便不相宜。如能犧牲若干自己的意見，就可以。」<sup>〔四〕</sup>他是特立獨行之人，可以成為革命者思想上的同志，但對組織性的行為總是保持有分寸的距離，原因無它，他讀了太多的歷史，也經受了太多背後射來的冷箭，因而早就洞察了少年屠龍的弔詭。

早在一九二五年，魯迅就說過：「革命以前，我是做奴隸，革命以後不多久，就受了奴隸的騙，變成他們的奴隸了。」<sup>〔四〕</sup>南京政府成立以後，斯諾採訪魯迅，問他：「你們

已經進行了第二次革命，或者說國民革命了，難道你覺得現在仍然有過去那麼多的阿○嗎？」魯迅哈哈大笑：「更糟了，他們現在還在管理國家哩。」<sup>【五】</sup>一旦窺透了歷史的自循環邏輯，魯迅斷然放棄了一切對未來的粉紅色夢想以及對天堂的憧憬，他悲哀地寫道：「稱為神的和稱為魔的戰鬥了，但並非爭奪天國，而在要得地獄的統治權，所以無論誰勝，地獄至今也還是照樣的地獄」。<sup>【六】</sup>

魯迅的虛無，在思想的源頭上，究竟來自何處？陳獨秀在五卅時期曾經說過：「中國底思想界，可以說是世界虛無主義底集中地，因為印度只有佛教的空觀，沒有中國老子的無為思想和俄國的虛無主義；歐洲雖有俄國的虛無主義和德國的形而上的哲學，佛教的空觀和老子學說卻不甚發達；在中國這四種都完全了，而且在青年思想界，有日漸發達的趨

【一】魯迅：〈小雜感〉，載《而已集》，頁一〇一。

【二】景宋：〈民元前的魯迅先生〉，載孫伏園：《魯迅先生二三事》（長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九年），頁五十。

【三】《魯迅景宋通信集》（長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四年），頁六八。

【四】魯迅：〈突然想到·三〉，載《華蓋集》，頁十。

【五】《斯諾文集》第一卷（北京：新華出版社，一九八四年），頁一五八。

【六】魯迅：〈雜語〉，載《集外集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一九七三年），頁六四。

勢。」<sup>〔二〕</sup>不幸的是，魯迅的一個人身上，竟然齊備了這四種虛無主義。他受章太炎的影響，在清末民初的十年潛伏期，收集閱讀了大量佛教經典；德國尼采式積極能動的虛無主義亦是其思想的底色，俄國的虛無主義作品，是魯迅翻譯介紹中的偏愛，而老莊和魏晉，偏偏又深入到他骨髓裏面。這四種思想相互呼應，在魯迅的精神世界裏面，構成了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虛無與絕望。

這種本體論意義上的虛無主義，就是所謂的黑暗與虛無的「實有」。世界的本質就是「無」，人的生命本質亦是如此。黑暗並非僅僅來自於外部的環境，而是內在於宇宙與人心之中。魯迅有清醒的自我意識，意識到自己內心裏面揮之不去的「鬼氣」與「毒氣」：「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裏有毒氣和鬼氣，我極憎惡他，想除去，而不能。」<sup>〔三〕</sup>周作人也是一個虛無主義者，但他對人與對自己，都比較寬容，可以超脫瀟灑地活著，而魯迅，無論對人對自己，都過於嚴苛，反而活得很累。這個累，最不堪負擔的，是心累。在黑暗中呆了久了，他竟然迷戀於夜的本身，他說：「愛夜的人要有聽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，自在黑暗，看一切暗」，「愛夜的人於是領受了夜所給予的光明」。<sup>〔四〕</sup>

這個在心底裏面迷戀和把玩黑暗的愛夜人，為什麼終於領受了「夜給予的光明」？這就要回到《野草》中那句來自著名的「絕望之於虛妄，正與希望相同」。<sup>〔四〕</sup>虛妄，無論對